

编者语 九一八事变爆发已95周年。今天,让我们以阅读的方式铭记历史,回望烽火岁月,触摸民族苦难与抗争的印记,在字里行间汲取力量,不负先辈热血,守住民族根脉,勇担时代之责。

孩童视角下的抗战叙事

本报记者 杨 竞



本报记者:是什么触动了您写抗战题材的儿童小说?

张忠诚:作为一个作家,我想要为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无名英雄树碑立传。少年儿童群体不大可能直接阅读大量史料,历史对于他们而言,更多的是历史教科书中的简约表述,因此,我想以儿童文学的角度,为少年儿童了解历史提供更丰富的故事和更富有感染力的细节。

本报记者:为创作这本书您都做了哪些准备?

张忠诚:秉承“用文学书写历史”的创作原则,我进行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的收集与阅读。《牛犇山下》《谁在林中歌唱》等5本书的素材将近500万字,加上网上阅读,超过1000万字。从这么多史料中打捞出来的历史信息是非常丰富的,《牛犇山下》中的白丑、黑丑、巴老海等人物在史料中都有原型,细节也有出处。他们都是战争的受害者、牺牲者,都应该被纪念。

本报记者:有评论家认为,《牛犇山下》真实地再现了80多年前东北大地上普通人的生存样貌,对此您怎么看?

张忠诚:《牛犇山下》里有一个历史背景,日本人在东北实施的“集家并屯”,战争史学家称之为“东方集中营”。然而,这一段历史,却从未像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样被文学艺术表达,从而被世界广泛知晓。

这是一段应该被书写和记住的苦难史,我认为,在这片土地上长大的人,也必须知道这段历史。女孩白丑、小兵罗宝、盲民间艺人巴老海、母亲喜凤、甲长宝善

提及张忠诚的东北抗联题材创作,绕不开他的《牛犇山下》《谁在林中歌唱》和“东北抗联三部曲”。这五部作品与文学史上诸多儿童抗战小说不同,它没有刻意渲染战争的残酷,而是以儿童的视角去看战争中的苦难与挣扎:是普通家庭的破碎,是少年眼中的恐惧,更是绝境里不曾熄灭的火种。比如《牛犇山下》中的女孩白丑,是儿童文学抗战题材书写中一个崭新的典型人物形象,她既平凡又不平凡。儿童视角下的抗战叙事,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故事?为何选择让白丑等人物成为历史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在与张忠诚的对话中,我们找到了答案。

等人物个性鲜明,立体丰满,他们在苦难中的抉择、坚守与成长,正是伟大抗战精神在个体生命中的生动投射,具有感动心灵的力量和真实感。

比如巴老海,一个盲人,以弹三弦唱鼓书为生,是那个年代最卑微的民间艺人,但从他身上,能看到真正的勇气和大义。光明与他无关,但他却做了别人的灯烛。我写下他的时候,涌上一句朴素感慨——巴老海,真仁义也,真勇士也。

本报记者:这本书最初叫《孤儿》,几经修改,才定名为《牛犇山下》,还有书中的“白丑”和“黑丑”,这些名字有着怎样的象征意义?

张忠诚:牛犇是一种农具,是牛的枷锁。一头小牛,想成为出色的耕牛,必须要经过牛犇的磨砺。牛犇象征着苦难和隐忍。



“白丑”和“黑丑”,则是牵牛花的种子。我用牵牛花的种子做两个孩子的名字,是想告诉自己,我写下的生命是普通的,也是顽强的。

本报记者:在《牛犇山下》里,您写儿童在战争中,而不是战争中的儿童,为什么想到用这样一种方式来书写?

张忠诚:战争对于儿童这个群体,伤害是最大的。因为战争,许多孩子在本该无忧无虑的年纪死去。《牛犇山下》写的不是“少年战士”,而是聚焦苦难中少年儿童的生存与觉醒,通过白丑在战争中的经历,用她的眼睛、认知和理解,诠释伟大抗战精神的内涵。

本报记者:在这本书里,您还写下了勇气,白丑这个女孩的勇气,能带给我们什么?

张忠诚:勇气这个词不如顽强、坚强

那么显眼,但它是这些词语的底色,没有了勇气,顽强、坚强无从发生。可以说,勇气是一种生命的气象。

亲人的离开,死亡的恐惧,从一个围子到另一个围子,只为送一封救命信,这些无疑都需要白丑付出巨大的勇气。但这不是最打动我的,我以为,一个小女孩,在经历了亲人死亡的威胁后,还能抱有对新生和未来的向往,这需要巨大的勇气。

本报记者:书中结尾写到玉米粒,这有什么深意?

张忠诚:白丑是不幸的,她失去了至亲,小童年纪过早地承受了痛苦。然而她心中始终有一盏不灭的灯——44颗玉米粒是父亲的叮嘱,是活下去的念想,饿时没舍得吃,怕时怀揣着它就敢往前走。玉米粒既是种子,也是希望的具象。战争结束了,她的梦想却又无法实现,因为陈年的种子无法发芽,这是命运与她开了一个玩笑。幸运的是她最终没有成为孤儿,玉米地之梦还有人替她守护。村里的孙爹在夜里为她偷偷换上新种子,他在守护一个女孩的希望,也是对这个女孩的勇气最好的奖赏。

记者:书中孩子们的命运,对于当下的孩子有何成长意义?

张忠诚:关于战争,有许多媒介可供孩子们去了解更真实的历史。而在《牛犇山下》中,还有另外的价值——对成长的理解,在“过去与现在”和“战争与日常”的多重互鉴中,建立对成长的新认知。牛犇村孩子们的命运对当下儿童成长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精神坐标系”的参照。坚强、善良、乐观、勇气,这些都是任何时代背景下长大的孩子不可或缺的基本品质。

多重史料印证抗战历史逻辑

刘国强

东方会议国策文献、满铁原始档案、关东军绝密电文、《李顿调查报告书》、东京审判庭审查卷等多重权威史料相互印证、层层闭环,完整还原了日本蓄谋侵华的历史真相。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民众14年不间断的自发抗争史实,史学界严谨锚定: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式起点,中国抗日战争是始于东北、遍及全国、贯穿14年的完整民族解放战争。

研判抗战起点在日本自身形成的侵华预谋证据链。1927年日本出台《对华政策纲领》,公开确立“独占满蒙”的侵略政策,将东北定位为日本“生命线”,这是侵华战略的持久“阳谋”。此后数十年,满铁海量调查档案持续输出情报,对东北地理资源、军政布局、社会民生开展全方位测绘摸底,为军事入侵、殖民统治完成周密筹备。

与此同时,关东军历年绝密作战电文、军事部署密令层层衔接,清晰记录了日军从试探渗透、制造事端到蓄意开战的完整步骤。东方会议、满铁档案、关东军密电构成一条时间连贯、逻辑闭环、细节翔实的侵华预谋证据链,充分证明:九一八事变绝非偶然军事冲突,而是日本蓄谋已久、精心筹划的侵华开端。

国际司法文献的前后变迁,则从全球视角佐证了抗战起点,完成国际维度的史实锚定。《李顿调查报告书》明确指出,日本于1931年9月18日夜间的军事行动,不能被视为合法的自卫措施,而是经过预谋和计划的行动。报告明确声明“东三省为中国之东三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权属于中国。战后东京审判过程中,法官采信东方会议纪要、关东军密电、满铁调查资

料等海量铁证,依法判定日本侵华始于九一八事变。从李顿调查团的战时定性,到东京审判的司法终审,国际社会完成了从事实确认到法理定罪的认知升级,以国际公义视角,印证了1931年作为抗战起点的合法性与权威性。

14年抗战史观的核心支撑,更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民众从未中断的局部抗战史实,这是最鲜活、最厚重的民心铁证。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奉行不抵抗政策,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第一时间发表抗日宣言,号召广大民众武装救国。共产党人整合抗日武装,建立游击根据地,在冰天雪地中开展游击战、破袭战,阻击日军殖民推进,牵制了数十万关东军兵力。从1931年局部抵抗,到1937年全国全面抗战爆

发,东北军民14年浴血奋战,用血肉之躯筑起中国最早的抗日防线。

日方原始档案证明侵略预谋在先,国际司法文献确认侵略事实定性,我党领导的东北抗争佐证抗战行动持续,三者闭环互证,彻底厘清了历史脉络: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开端,更是中国人民14年抗日战争的起点。

14年抗战史观的正式确立,不是简单的时间调整,而是对历史真相的完整还原,对民族英烈的崇高告慰,同时印证了抗战历史逻辑。它让世人清晰看见: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始于东北、全程坚守、全民参与、持久制胜的伟大民族抗争。以多重史料锚定历史起点,既是尊重史实、敬畏英烈,更是铭记来路、砥砺前行,让14年浴血荣光,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之上。

资料表明,1927年至1960年期间,“731部队的主要军官中,至少有23人凭借活体实验发表论文并取得博士学位”。731部队主要创立者石井四郎更是被美国聘为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顾问。

“伯力审判”公信力被抹黑

1949年,苏联军事法庭“在伯力起诉了山田乙三、川岛清等12名日本细菌战战犯”,并将审判信息公之于众。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除了对苏联的正常调查取证从中作梗外,还发动舆论机器,肆意抹黑“伯力审判”的公信力。金成民认为,苏联在揭露731部队人体实验的做法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书的后半部分,金成民介绍了一些日本正义人士、民间团体,以及一些曾在731部队服役甚至亲身参与人体实验的军医。虽然有的人开始反省忏悔,但在日本右翼的恐吓下,能够公开站出来的依旧屈指可数。另一方面,没有得到彻底清算的日本并没有真正走上反省之路,反倒努力塑造战争受害者的委屈形象。最典型的是,他们对广岛原子弹爆炸大张旗鼓地纪念,而对于南京大屠杀这样早就为国际公认的历史事实却讳莫如深。

书市观澜

创伤反思成二战图书主线

姚雪痕

今年截至8月末,新出版的、公开报道可检索到的二战题材重点图书约有40种至60种,单纯罗列会战、聚焦将帅谋略的军事通史热度明显回落,读者更加青睐史料扎实、视角多元、具有人文温度与现实思考的作品。正是这些兼具史料价值、文学感染力与时代意义的作品,让抗战记忆获得长久的传播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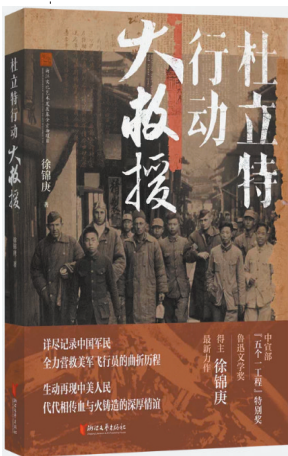
今年新出版的二战题材图书,视野从局部走向全球,镜头从将帅转向平民,立意从战争记述走向深度反思。作品涵盖学术文献、大众纪实、青少年读物三条产品线,融媒体图文、影像画册、IP联动产品不断丰富。

立足全球反法西斯战争框架,强化东方主战场地位,国际协作、战后审判成为热点选题。过去,不少二战读物习惯以西欧战场、太平洋战事为主线,中国战场沦为配角。2026年出版的重磅作品则打通中外史料,将14年抗战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整体链条中重新定位。国际协作类纪实图书市场表现亮眼,《杜立特行动大救援》依托中外档案、田野走访与幸存者口述,还原浙赣民工冒死营救美军飞行员的往事,上市后迅速登上历史纪实畅销榜单。《大国博弈:李顿调查团与东亚危局》依托国联原始档案、多国外交文献,融合报刊、民间呈文等一手资料,构建起完整的证据链条,从全球视野复盘各方外交博弈,厘清九一八事变后的东亚变局,为读者理解二战序幕时期远东国际关系提供了历史参照。这类作品不再局限国内叙事,而是着力面向国际传播史实,成为主题出版的一个重要方向。

宏大战役叙事降温,微观社会史、个体口述、平民记忆受到关注,小切口书写大历史成为主流。读者不再满足于战役进程的简单铺陈,渴望看见战争中普通人的命运与悲欢,以普通士兵、沦陷区民众、知识分子、妇女群体为叙事主体的非虚构作品持续热销。出版社大力挖掘家书、日记、民间访谈、地方档案等一手民间史料,文化抗战、后方生存史、地域抗战史料大量推出。《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避开硝烟战场,聚焦流亡知识分子在大后方的国殇坚守,以个体求学、谋生、救国经历折射民族苦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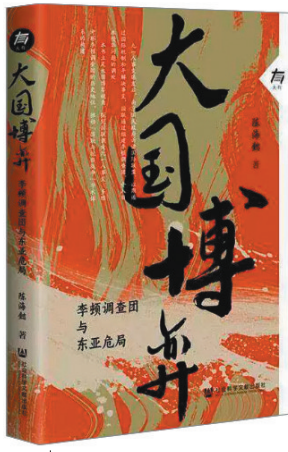
作品重心从记述战争过程,转向战争罪责溯源、创伤反思与和平镜鉴,历史警示价值进一步凸显。出版不再仅仅回顾浴血抗争,而是深入剖析军国主义根源、战争创伤的长期影响,直面战争遗留问题,完成从“铭记抗争”到“反思灾难”的进阶。《黑盒七三一》是本年度现象级纪实作品,作者依托跨国取证、独家解密档案,完整还原731部队细菌战与人体实验罪行,同时探讨战后战犯被庇护、罪证遭到掩盖的历史真相,跳出单纯惨案记述,深刻反思极端思潮与人性之恶。译著《1932—1945年日本生物战部队在中国进行的医学人体实验》引入海外学者研究成果,中外史料相互印证,进一步夯实罪证链条。《日本侵华罪行与沦陷区(全8册)》系统梳理重庆大轰炸、强征劳工、殖民掠夺等历史创伤,兼顾史料整理与现实镜鉴。这类图书立足铁证回击历史虚无主义,将战争记忆转化为面向当下的和平警示,契合当代读者深层次的精神需求。

荐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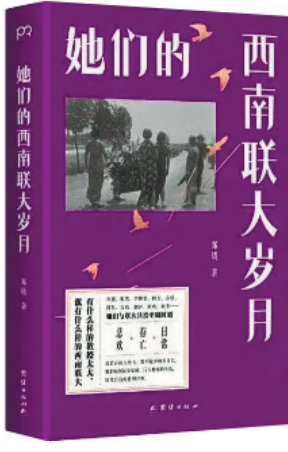
《杜立特行动大救援》
浙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徐锦康辗转多省实地走访,结合中外档案、口述回忆与老照片,还原1942年美国中校杜立特率16架轰炸机空袭日本后迫降中国东南地区,中美军民以衢州为中心展开跨国救援行动,最终使得64名飞行员成功脱险这一历史事件,再现危难时刻的人性光辉。



《大国博弈:李顿调查团与东亚危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九一八事变后,当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组建李顿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事变真相。书中依托国联原始档案,多国外交文件与民间呈文,梳理调查团的形成、调查过程与外交博弈,剖析国联调停的局限与失败,为理解二战远东起源、反思国际秩序困境提供历史参照。



《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
团结出版社

作品聚焦西南联大的教授太太,通过梳理日记、书信、回忆录等零散史料,描绘了她们在物资匮乏年代,通过制卖定胜糕、种菜饲养家禽等方式支撑家庭,并在战乱中处理生育危机与情感困境的历程,补充了抗战社会史的侧面,是微观化抗战题材写作的典型样本。

沉埋的罪证 漫长的昭雪

陈 斌

提示

十年前看《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时读到,对手建立了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的石井四郎及其帮凶,美方竟然同意,“把731部队的情报资料数据全部提供给美国,作为交换条件,免除其全体人员的战犯罪罪”。其作者对731部队的这段“洗白”内幕语焉不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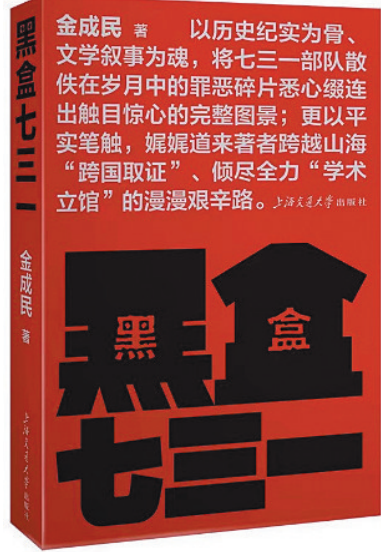
直到今天,读到由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历经数十年,30余次赴日本跨国取证,留存口述音像档案逾400小时,收集罪证文物逾2万件、档案史料逾30万页,最终浓缩成《黑盒七三一》这本书时才发现,虽然二战已结束大半个世纪,但历史真相的揭露依旧艰难且漫长。

多方求证得出两个结论

731部队人员配合美国调查,“这些资料被整理成《桑德斯报告》《汤普森报告》《希尔报告》《费尔报告》”。在详细研读美国的解密报告后,金成民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报告足证731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开展了人体实验;二是当年美国对731部队所作所为心知肚明,却在东京审判问题上极力为731部队人员脱罪。在逃脱历史的审判后,“共有79名日本细菌战战

犯在战后继续受到重用”。

金成民指出,通过多方求证,“已确认1939年至1945年间,至少7000余名无辜者在哈尔滨平房区被用作活体实验材料,无一生还。”为进一步佐证这些历史,金成民还搜集了当年“特别移送”资料——“1938年1月26日,关东军司令部警务部下发了第58号文件,规定并实施‘特别移送’。凡是被宪兵队逮捕的反满抗日人员、谍报人员,经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下达‘特别移送’指令后,即由各宪兵队秘密送到731部队作为细菌实验‘材料’。”



秘密协议令战犯脱罪

1933年,石井四郎在中国哈尔滨市南岗区秘密设立细菌研究所,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35年至1936年间,日本参谋本部及陆军省按照裕仁天皇的密令,在中国东北成立了两支准备进行细菌战的部队,其中,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为731部队的前身。1939年5月爆发的诺门罕战役,“成为日本细菌战的首次实战试验场”。接下来,日军在中国多地战场上实施了细菌战。

金成民查阅大量史料发现,对于开展细菌战研究一事,日本军政高层不仅知情,还参与组建、实施,以及销毁证据决策全过程。金成民指出:“诺门罕战役让苏联意识到日本有一支生化部队,而美国知道日军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战已经是1941年的事了,比苏联晚了两年多。”

二战结束前,东西阵营对立雏形已现。1945年,麦克阿瑟踏上日本后,为获取731部队研究的数据资料,“与石井四郎等731部队成员达成秘密协议(《缴仓协定》)”,条件是:“731部队用在中国进行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研究的机密数据换取美国的庇护”,“美国最终获取了731部队在中国进行人体实验、细菌实验、毒伤实验等数据资料及实验报告”。美军与731部队相关人员沆瀣一气,令手握证据前来提审的苏联人颗粒无收。